

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 研究的基本特点

余大钧

王国维（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大学者，是本世纪来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我国伟大学者之一。王国维对经学、古文字音韵学、史学有较深造诣，他在甲骨金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古器物、商周史、古代北方民族史、西北地理、蒙古族史元史、古代戏曲史等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大量关键性重要学术问题，对我国学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这位卓越的大学者多年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和他在学术上取得多方面卓越成果的主要原因，我们有必要进行研究、总结，以作为我国学术研究工作者今后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借鉴。

本文试图主要从王国维对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族史、元史的研究工作方面（有时也旁及他的其他方面研究成果）探讨、总结王国维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和他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主要原因。本文首先对王国维在北方民族史、蒙古族史、元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然后分析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及其卓有成就的主要原因。抛砖引玉，希望学术界同志们对这个题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总结。

（一）

王国维对匈奴史及先秦时代我国北方游牧部族史的研究作出过不少贡献。王国维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鬼方昆夷獯豨考》、《西胡考、续考》、《胡服考》、《匈奴相邦印跋》、《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载《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十三、二十二、十八，《别集》卷一）等文，在这些论文中王国维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鬼方昆夷獯豨考》、《胡服考》、《匈奴相邦印跋》三文尤其突出。

《鬼方昆夷獯豨考》，写成一九一五年三月。王国维在这篇论文中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和钟鼎彝器铭文论述鬼方、昆夷、薰育、獯豨等先秦游牧部族的活动地区、活动情况、部族名称的起讫时代以及部族的大小强弱情况，并从地理分布及音韵学角度论证鬼方、昆夷、混夷、薰育、鞞粥、獯豨、豨豨以及后来的匈奴、胡等部族名称均系同一部族名的异译。

他的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国内不少学者如梁启超、方壮猷、冯家升、佟住臣等在后来发

表的论文中都附和他的“鬼方、昆夷、狁狁等部族即匈奴”的说法^①，但另一些学者如蒙文通、黄文弼等则有不同看法^②。尽管王国维这篇论文的“鬼方、昆夷等族即匈奴”的说法迄今未能成为定论，犹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但这篇论文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了先秦西北游牧部族，其所据多方面第一手材料之丰富，见解之精辟，迄今仍为这方面研究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学术论文。

《胡服考》，写于一九一五年八月。这篇论文广泛引用两汉至唐宋的文献记载，论证了从赵武灵王时(公元前四世纪末叶)起，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包括冠、带、褶、袴、靴等“胡服”逐渐为我国历代内地汉族所采用的情况。这是一篇研究我国古代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关系史的重要论文。

《匈奴相邦印跋》，写于一九二二年。这篇短文根据战国时戈文、剑文结合文献记载，考定匈奴相邦玉印上的“相邦”二字的含义，即相国、丞相，并认为匈奴单于及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均自置相邦。文中还根据玉印“形制文字，均类先秦”，与汉朝赐匈奴的官印不同，认为此印属匈奴初期用先秦文字自造之印。这篇论文对研究匈奴官制、匈奴文化以及匈奴与内地汉族的文化关系均有重要价值。

× × ×

王国维对蒙古地区六至九世纪突厥、回鹘族史也作过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有《高昌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苾伽公主墓志跋》(载《观堂集林》卷二十、《观堂别集》卷二)等。

写于一九一九年的《高昌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跋》考释了土鲁番五五五年所立《麹斌造寺碑》上的官号希利发、输屯发。王国维认为希利发即突厥官号俟利发，又为突厥授予其属国首领之官号。由碑阴高昌王麹宝茂结衔中有希利发字样可知：五五五年时高昌即已成为突厥属国，也可知：当时突厥已有将俟利发官号授予其属国首领的制度。输屯发，王国维认为即突厥官号吐屯发或吐屯，为监察之官，“惟唐时突厥命其国人为吐屯，以监统属国，此则以高昌国相为之”，可见当时高昌对突厥有较大独立性。王国维据《碑》文指出高昌在五五五年以前即与突厥同盟结婚，又据《隋书》等文献记载，指出此后二国世为婚姻。王国维的这篇论文是研究突厥官制，研究突厥与其属国、属部的关系，以及研究突厥与麹氏高昌国关系史的重要论文。

写于一九一九年末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根据新旧《唐书》等考释了碑中九代回鹘可汗的名号、事迹，并纠正了两《唐书》译名的讹误，还考释了若干重要人物、地名、部族，对碑中若干缺字进行考定，厘正了碑文，阐明了碑中所记史实。例如，他考证《碑》之爱登

① 见梁启超：《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四一、四二；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国学季刊》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第二卷第四号；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载《禹贡》一九三七年五月第七卷第五期；佟佳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载《学艺》一九四二年第二辑。

② 蒙文通在《犬戎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载《禹贡》一九三六年第六卷七期及一九三七年第七卷六、七期)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一九五八年版)中认为鬼方、荤粥、狁狁等并非匈奴，义渠则与匈奴同族。黄文弼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载《边政公论》一九四三年第二卷第四、五期)中认为鬼方、荤粥、混夷、狁狁都是古代羌族，与匈奴不同。

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即两《唐书》之保义可汗，并指出《旧唐书》所记此可汗之名号，本纪脱漏“爰”字，《回纥传》脱漏“汨”字，衍“蜜”字，《新唐书·回鹘传》则脱漏“没”字。又如，他考证九姓回鹘兼有拔悉蜜、葛逻禄，总共为十一姓（十一部）。根据九代回鹘世系之考证，他指出：回鹘可汗多出自宰相。这是结合文献记载与碑铭材料考订史料、研究唐代回鹘史事的论文。

（二）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元史的研究作出了丰硕的成果和贡献。王国维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即其一生的最后二年余期间用很多精力研究蒙元史。此外，在一九二五年以前他也曾对蒙元史的研究有过贡献。

他所写的有关早期蒙古族史方面的论著有《鞑鞞考（附鞑鞞年表）》（一九二五年初稿，一九二七年改写）、《朔古考》（一九二五年初稿，一九二七年改写）、《黑车子室韦考》（一九二七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一九二六年）、《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一九二七年）、《金界壕考》（一九二七年）、《蒙古札记》（一九二七年）（以上六篇载《观堂集林》卷十四至十六）、《耶律文正公年谱》（一九二五年，载《王忠愍公遗书》）。他的有关元史的文章有《元铜虎符考》（载《观堂集林》卷十八）、《书宋官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一九一三年，载《观堂集林》卷二十一）。

他所校注的有关早期蒙古族史料有《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以上三种一九二六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一九二七年）、《王延德使高昌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以上三种一九二五年完成，去世后发表）。

他所编辑付刊的蒙元史重要史料有：清代学者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元经世大典》佚文《大元马政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画塑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刘泖生抄本《元秘书监志》十一卷。以上七种均为世所罕见的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被他刊载在一九一六年他编辑的《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中。

他为蒙元史重要史料及蒙古刻本、元刊本所写的序跋有：《蒙文元朝秘史跋》（一九二五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蒙鞑备录跋》、《黑鞑事略跋》（以上四篇一九二六年）、《大元马政记跋》、《元秘书监志跋》（以上二篇一九一六年）、《四部丛刊李贺歌诗编跋》（一九二五年）、《元刊虞伯生诗续编跋》（一九二六年）、《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以上二篇一九二二年）等。

除了已刊印的著作外，王国维还有若干种未最后完成的遗稿以及经他手校和手批注语、考释、跋文的古籍一百九十多种并未付刊，大部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现珍藏在北京图书馆。其中有关蒙元史的有二十多种：遗稿有《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经他手校手批的古籍有叶德辉刻本《元朝秘史》（共有二部）、李文田《元秘史注》、何秋涛校本《圣武亲征录》（二部）、影抄汪鱼亭旧藏抄本《圣武亲征录》、光绪刻本《蒙古源流》（以沈宝熙藏钞本

书室抄本手校，又以《元秘史》、《元史》、《明史》等书详为校注）、李文田《西游录注》、日本刊本《西游录》、李文田《和林金石录》（以拓本等校补）、《湛然居士集》（四部丛刊本及浙西村舍刻本各一部）、《双溪醉隐集》（知服斋丛书本及影抄文津阁本各一部）等等。^①

× × ×

《鞑靼考》是王国维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首先简述了唐五代宋史籍中记载的鞑靼事迹，接着指出这一重要的北方部族名在《辽史》中仅三见，在《金史》中完全绝迹。于是他提出问题：“然则辽金三百年中，唐宋间所谓鞑靼者，果何往乎？观宋元人之著书，知当时固有鞑靼，其对辽金之关系，决非浅鲜，正史中必不容没其事，而竟不概见，此读史者当发之疑间也。”针对这个问题，他广征博引，对宋辽金史籍及《蒙古秘史》所记载的史实进行对比分析，并根据地理考证，详细论证了辽金史所记载的分布甚广、活动频繁的游牧部族阻卜（或其异译阻鞑）即是鞑靼。

《鞑靼考》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在王国维此文发表后五十余年来，许多学者不断就阻卜与鞑靼的关系问题撰文发表见解。^②有些学者反对“阻卜即鞑靼”说，如徐炳昶在一九三〇年发表的《阻卜非鞑靼辨》一文中，完全否认“阻卜即鞑靼”说，他认为阻卜是唐古特族，而鞑靼是蒙古族，两者根本不同。但多数学者如伯希和、冯承钧、蔡美彪、陈得芝等都赞同、支持“阻卜即鞑靼”的说法。蔡美彪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辽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用《辽道宗哀册》中关于鞑靼的纪事与《辽史》有关道宗时阻卜的记载互相比较考证，证实了“阻卜即鞑靼”。陈得芝一九七八年发表的《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一文的第四节引用了辽宋碑刻、地图、文集等资料进一步证实了“阻卜即鞑靼”。

《鞑靼考》一文所附《鞑靼年表》广泛收集散见史料，把九世纪后叶至十三世纪初三百年数十年间以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部落为主的鞑靼诸部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提供出来，为进一步研究此期间鞑靼诸部的历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

《蒙古考》是王国维研究成吉思汗一二〇六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著作。《蒙古考》广泛收集了汉文史籍和《蒙古秘史》、《马可波罗行记》、拉施特《史集》（洪钧译文）中的散见材料，把人们所不熟悉的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五六百年间蒙古诸部落在历史上的活动史实提供出来，为进一步研究早期蒙古诸部落历史提供了丰富材料。

在《蒙古考》中，王国维根据两《唐书》的记载考证蒙古诸部的发源地在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一带，这一看法为后来多数者所赞同，也与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史集》上的记载相吻合。

① 详见赵万里《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载《国学论丛》一九二八年第一卷第三号。

② 见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辨》，载《女师大学术季刊》，一九三〇年三月第一卷第一期；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伯希和：《评王国维遗书》，载《通报》一九二九年第二十六卷，汉译文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唐长孺：《论阻卜之异译》，载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十九期；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载《北大园学季刊》第七卷第三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一九七八年；余大钧：《论阻卜与鞑靼之异同》，载《朔方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等等。

在《萌古考》中，王国维认为汉籍中的梅古悉、摸葛失、毛割石、鞭劫子、萌古子、盲得子、蒙因斯、蒙古斯、蒙子、萌子等名，以及蒙兀、蒙古、萌古、蒙古里等名都是蒙古的同名异译。这一看法基本上得到伯希和的赞同，伯希和从语言学上解释说：“蒙古”的一部分同名异译系从一种鄂音甚重的语言如契丹语之类转译，并附加以多数语尾-S；另一部分异译则省译了语尾；而“蒙古里”这个异译则带有语尾-l。因此“蒙古”的这些同名异译在语言学上都是解释得通的。^①

在《萌古考》中，王国维广征博引宋辽金史籍及《马可波罗行记》论证蒙古诸部在辽代时期已有一部分南徙至阴山一带，这是一个材料根据相当丰富的重要见解。

《黑车子室韦考》研究了蒙古语族室韦诸部中的一部分：黑车子室韦部落南迁的史实。此文首先根据《辽史·百官志》上的记载，纠正了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在《辽代乌古敌烈考》一文中将黑车子室韦误分为黑车子部及室韦部两个部落名称的错误。接着引征史料考证黑车子室韦即《旧唐书》之和解室韦，其原住地在今呼伦泊东南、兴安岭左右，当九世纪中叶回鹘国衰亡之际，随回鹘南下，在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经常出现在幽并近塞（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及河北省西北部一带）。这篇论文对研究蒙古族室韦部落的一部分南迁，从原来的以狩猎为主、兼营粗放农业的生活方式南迁到内蒙乌盟、锡盟大草原上转变为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很有价值。该室韦部落之所以冠以“黑车子”之称，显然是由于转变为草原游牧部落后拥有大量为游牧、迁徙所必需的黑车，在生活方式上明显地与原来的其他室韦诸部不同之故。

《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根据《蒙古秘史》有关主因亦儿坚事迹的几段记载进行分析，并分析《金史》中有关纥军的记载以及《元圣武亲征录》、拉施特《史集》（洪钧译文）的有关记载，考证出《秘史》之主因亦儿坚即是金朝后期之纥军，又据《金史》，《秘史》等史籍的记载考证出金朝后期纥军的基本情况和事迹如下：金朝之纥军“大抵多契丹人。当金之中叶，运戍呼伦、贝尔两湖之间，与塔塔儿人杂居，故中有塔塔儿人。后复徙泰州近塞。大安之季，刺史术虎高琪率之以援中都，因与于怀来之役。后复叛金，与蒙古共围中都。旋有异志，蒙人恶其反覆，遂分其众以赐功臣。”

此文所附《致藤田博士书》二封，也有重要价值。二封信中广征博引了大量材料，探讨了纥、纥的各种可能读音。在第二封信中曾发表了“辽金元三史中之纥字，绝非误字，其或作纥者，乃纥字之省”的精辟见解。

王国维在上述二封信中探讨“纥”字的读音尽管曾游移于各种可能说法中，但根据他所考定的“主因亦儿坚即纥军”的结论以及他所指出的“《辘耜录》汉人八种中有竹困、竹温、竹亦歹，许有壬《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元史·慎海传》并有只温，皆主因之异译”，应当认为他基本倾向于认为“纥军”之“纥”应该作“主”或“竹”（其对音为ju）。

《金界壕考》一文根据《金史》的记载考证了金朝为防御西北蒙古语族游牧部落多次修筑边堡界壕的经过，又据辽金元史、《秘史》、拉施特《史集》、《张德辉纪行》、《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大量文献资料考证了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界壕的大致路线以及沿线及沿

^① 见伯希和《译王国维遗书》汉译文，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第六十九页。

线附近重要地名的位置，尽管由于缺乏实地考察材料，他的考证结果有若干不确切和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他的这篇论文成为后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金界壕遗址并综合实地考察材料与文献资料进一步确定金界壕线路的重要参考文献。^①

× × ×

王国维的一些序跋、札记之类的短文也不乏佳作。《蒙古札记》中的《烧饭》一则考释此词为契丹女真族旧俗，即焚烧饮食及死者生前所用车马衣物送葬祭祀之仪，并指出汉魏时乌桓族已有类似习俗，蒙古族也有这种习俗，至清初满族犹有类似习俗。《蒙古札记》的《扫花》一则根据元代史料考释蒙语“扫花”一词意为人情钱、贿赂之钱物，纠正了那珂通世的误译。《圣武亲征录校注序》考证《亲征录》完成于元世祖时，并非元仁宗时察罕从蒙文《脱必赤颜》译成之《圣武开天记》，澄清了过去学者的误解。《蒙鞑备录跋》考证此书原题宋孟珙撰之误，根据宋代史籍考证出此书作者实为赵珙，于一二二一年奉淮东制置使贾涉派遣至燕京木华黎处议事，而非奉宋帝之命出使蒙古。《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根据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愿文》、伯希和从敦煌劫走的西夏文经卷末尾的汉字印记以及《元史》本纪的记载，考定罗振玉等藏西夏文华严经残卷为元代刊本，而非西夏原刊，此刊本始刊于元世祖时，至元成宗大德六年刊成。

× × ×

王国维晚年在校勘、注释早期蒙古族史基本史料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圣武亲征录》中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部分，与拉施特《史集》的《成吉思汗纪》同出一源，是研究成吉思汗时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有关窝阔台记载部分，尽管较简略，由于是第一手材料，也有重要价值。以往有何秋涛校勘本，但所据底本不佳，校勘不精，讹误仍多。王国维找到弘治抄、万历抄《说郛》本以及注鱼亭旧藏抄本三个较好的《亲征录》抄本与何秋涛校本互校，并根据大量史籍加以注释，完成了远远超过何秋涛校本的《亲征录》优秀校注本。他在校勘时除利用上述不同本子进行版本校外，还联系《亲征录》前后文进行本校，并根据《元史》、《秘史》、拉施特《史集》等史籍进行他校。他的注释对不少地名、人物、官号、部族、年代、史实作了精辟的考释。如：考释弘吉剌部长迭夷即特薛禅，鱼儿浜非捕鱼儿海子、而为达里泊，察兀忽鲁并非招讨使，斡丹罕所杀主帅素温为官号而非人名、实即辽金官号详稳之异译。关于《亲征录》乙亥年（一九一五年）的一大段纪事，王国维说：“此节系明人窜入，盖乙亥事此《录》以行文之便豫叙于甲戌，故此年无事，拉施特书亦无猪年事，其证也。后人取《元史》本纪补之，不悟与上重复。”关于《亲征录》庚辰（一二二〇年）至甲申年（一二二四年）征西域的记载，王国维根据当时亲历西域的耶律楚材、丘处机的诗文及其他材料考证出这五年的记载都后于事实一年。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一二一九年奉成吉思汗诏从山东经蒙古地区远赴中亚、

^① 参阅贾洲杰：《金代长城》，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七七至八三页。庞志国：《金东北路、临潢路吉林省段界壕边堡调查》，载同上报告集，第八四至九二页。

阿富汗等地，至一二二四年返回燕京的往返沿途经历和见闻。这部游记对研究当时蒙古族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当时华北、蒙古地区、中亚等地的情况，成吉思汗西征事迹，成吉思汗与宗教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王国维用明正统《道藏》本校勘《连筠蓀丛书》本《西游记》，并用辽金宋元明史、金元文集、《辍耕录》、《道藏》、《至元辨伪录》、《亲征录》、《秘史》、拉施特《史集》、《西游录》等大量古籍，对此书中所记人物、地理、风尚习俗、史实等详加注释，完成了优秀的校注本。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是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史料。王国维以《说郛》本《蒙鞑备录》校《古今逸史》本，详加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又借抄出源于明代姚咨抄本的一个《黑鞑事略》抄本，收集散见史料加以注释，完成《黑鞑事略笺证》。这两种笺证，注释丰富，考证精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注本。

(三)

王国维在蒙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如下特点：

1，研究范围之广博，研究成果之精深、丰硕。

王国维学术研究范围极其广博，在他一生中对文学、艺术、经学、史学、古文字音韵学、甲骨金石、敦煌文献、汉晋木简、古器物等均作过精深的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在各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仅就蒙古史而言，他的研究范围也是很广的，上起先秦北方游牧部落鬼方、昆夷、獯豸，下至匈奴、突厥、回鹘、室韦、鞑靼、阻卜、蒙古，他都作过较精深的研究，作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他的蒙古史方面的已刊印的学术研究成果共约二十六万字。其中有关蒙古史的重要史籍校注本共约十四万三千字（《圣武亲征录校注》约五万四千字，《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约五万二千字，《蒙鞑备录笺证》约一万二千字，《黑鞑事略笺证》近二万字，《西使记》、《北使记》、《王延德使高昌记》校注共约五千字），有关蒙古史的考证文章、序跋、札记、年谱等各种论著近三十篇，共约十一万七千字（不包括译文及研究元曲的论著）。王国维在蒙古史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有较高学术价值，解决了不少重要学术问题。

2，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半属于考据性质，但他的考据解决了大大小小各种学术问题，而非繁琐无聊的文字游戏

王国维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他对各种重要古籍的校勘、笺注，或是他所撰写的论文、序跋、札记、年谱、年表，多半都属于考据学范围。但他的考据大体而言都是为解决学术发展所必需解决的各种问题而进行的。无论是他对版本、作者、甲骨金石、汉晋木简、敦煌文献、古器物、音韵文字的研究，或是他对地名、人物、部族、风尚习俗、制度、官号、年代、史实的考证，他基本上都抓住了学术发展所必需解决的问题来进行。从而他解决了许多重要学术问题，其中有不少是学术发展上的重大关键性问题。在蒙古史研究方面，如前所述，他的《鞑靼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萌服考》等文都解决了学术上的重要问题，他的蒙古史料校注本中的注释和序跋札记之类的短文也澄清和解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学术问题。作为推动我国学术发展在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显然不同于做无意义的繁琐考据文章的无聊文人。

3, 他所校注的古籍多半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古籍, 在校注时他尽可能利用较好的多种不同版本仔细互较, 并广泛收集散见于各方面的有关材料详加注释, 从而他完成了不少迄今仍有价值的优秀的古籍校注本。

在蒙古史方面他所校注的古籍、史料全都是对研究蒙古史有重要价值的, 如前述《圣武亲征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如前所述, 他的《亲征录》校注本, 是用当时他所努力找到的较好的抄本弘治、万历抄本《说郛》本和汪鱼亭旧藏抄本与何秋涛校本经过仔细互校, 并广泛利用大量史籍详加注释而完成的。他如《长春真人西游记》、《蒙鞑备录》等也是由他经过仔细校勘、详加注释而完成校注本的。

4, 他的论著是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且是尽可能用最好的本子经过仔细校勘过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因此, 他的论著就不同于只能依靠第二、三手材料, 袭用前人旧说, 拼凑成章的草率之作。

例如, 他的《鞑鞑考》是主要以他亲自辑集第一手史料而成的《鞑鞑年表》上的材料为根据写成的, 而《鞑鞑年表》上的许多材料又是从他亲自用尽可能最好的本子仔细校勘过的史籍(如《元朝秘史》、《亲征录》等)上摘录出的。

5, 他的论著是尽可能全面地占有不同来源的多方面第一手材料写出的, 因此往往能进行比较、分析或联系、综合多方面不同来源材料中发现重要问题, 发表独到的精辟见解。

例如, 《鬼方昆夷獯豨考》一文既大量利用了先秦两汉文献, 又利用了钟鼎彝器文的不少材料, 由于他占有多方面材料, 他就能发现问题、发表独到的见解, 后来的不少学者由于不能利用超过他的更多的方面材料就只能附和他的说法、基本上重复他的说法, 另一些学者反对他的看法, 但却往往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材料根据来。又如, 《匈奴相邦印跋》这篇短文, 由于既根据了文献资料, 又根据了战国时剑文、戈文材料, 从而他才能发现问题, 考证出“相邦”二字的含义, 并进一步发挥独到的精辟见解。《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既根据《元史》记载, 又根据日本收藏的佛经刊本以及敦煌经卷上的材料, 才能考定罗振玉等人收藏的西夏文经残卷为元刊本, 而非西夏原刊, 单是依据《元史》或其他正史是无论如何确定不了到底是西夏原刊, 还是什么时代刊印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及所附致藤田书, 既根据蒙文《秘史》, 又根据《金史》、《亲征录》、《辍耕录》等汉籍以及波斯拉施特《史集》, 才考定主因亦儿坚即是纥军, 作出“辽金元三史中之纥字, 绝非误字, 其或作纥者, 乃纥字之省”的论断和纥字读音的见解, 并基本上搞清了金朝后期纥军的基本情况和事迹。《鞑鞑考》则从综合分析唐五代辽金宋蒙史籍以及《阙特勤碑》文等多方面材料中得出“阻卜即鞑鞑”的论断。

6, 广泛参考利用前人及同时代人研究成果。

在王国维的古籍校注本和论著中, 前人如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丁谦等以及国外学者那珂通世等的著作, 同时代人如沈曾植、屠寄、柯劭忞等以及国外学者箭内互等的著作, 他都曾广泛参考利用, 其中有些学者的著作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到。

7, 王国维的文章扎实精炼, 往往以短小的篇幅解决重要问题, 文字简洁, 没有废话, 论断明快。

例如, 前述《匈奴相邦印跋》引用战国时戈文、剑文及正史记载考定匈奴玉印上“相帮”二字的含义, 并解释汉代史书上不称“相邦”而作“相闾”、“相封”的原因, 进而指

出匈奴单于及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均自置相邦，并认为此印属匈奴初期用先秦文字自造之印，与汉朝所赐匈奴官印形制文字不同。此文涉及不少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但王国维以及极其精炼的文字引用了材料，作出明快的推断，全文总共才用了三百二十九个字。又如《蒙轹备录跋》共七百多字、《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约五百七十字、《高昌宁朔将军魏斌造寺碑跋》约一千字、《黑车子室韦考》约一千七千字，都很短小精炼，解决了重要学术问题。较重大的考证文章也不甚冗长，例如在《鞞鞞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鬼方昆夷狁狁考》中，王国维为解决重大关键性学术疑难问题广征博引多方面材料、从好几方面进行论证，得出结论、解决问题，并作出若干推论，进一步说明了若干问题。像这样解决大问题的重大考证文章也只不过用了数千字。《鞞鞞考》全文共五千字，《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共六千多字，《鬼方昆夷狁狁考》共七千多字。

(四)

王国维是如何取得具有上述特点的学术研究上的丰硕成果的呢？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分析他的学术研究工作有如下基本特点：

1，长期认真从事整理校勘古籍、史料，收集散见材料，随时写眉批、校语、跋语、札记等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

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内他做了大量校勘、辑集、注释基本史料的工作，在其他研究领域内也是同样。他的这些基础工作是随时留意、经常进行的。每听到有较好的抄本，或罕见刊本，他就设法借来使用，或亲自抄出，并经常进行校勘，随时书写眉批、夹注、校语、跋语等。例如：他早就感到何秋涛等学者校勘《亲征录》所据底本不佳，讹误百出，虽经何秋涛等人一再校勘，谬误仍多，有重新校勘的必要。后来听说傅增湘藏有较佳的弘治抄《说郛》本《亲征录》，便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借来，用来校勘何秋涛本，并把校语写在何本（浙西村舍刻本）上。从傅增湘处又得知武进陶氏藏有万历抄《说郛》本《亲征录》，他便于同年二月末亲自到天津向陶氏借到万历抄本，用来校勘何秋涛本，把校语写在另一册何本（日本刊本）上。同时，他还从江南图书馆影抄出汪鱼亭旧藏抄本《亲征录》、与弘治抄本、何本互校，在此影抄本上写上校语。他的《圣武亲征录校注》就是从诸如此类的大量基础工作开始，逐渐完成的。从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一百九十多册手批手校古籍（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我们可看到眉端、行间、卷首、卷末，批有大量眉批、夹注、校语、跋语，这是他在多年中随时批写、逐渐积累起来的，他就是从不断积累点滴心得、收获中，逐渐完成他的各项著作的。

2，王国维的研究工作是从大量基础工作开始、花费巨大劳动、循序渐进完成的。

一九二五年春，王国维接受清华学校研究院聘请担任教授后，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他便首先从抄录、辑集、校勘、注释基本史料入手，先后亲自抄录过有关西北地理时蒙古史的《杜环经行记》、《高居诲使于阗记》、《王延德使高昌记》、《范业三藏行记》、耶律楚材《西游录》、刘祁《北使记》、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纪行》、《黑鞞事略》等许多重要史料，并进行校勘、眉批。在校勘、眉批的基础上，一再加工整理、补充、修改，完成了《古行记校录》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蒙古札记》七则。并根据批写的跋语,经过修改、补充,写成了《蒙文元朝秘史跋》、《黑鞑事略跋》、《蒙鞑事略跋》、《四部丛刊李贺歌诗编跋》等文。在辑集史料的基础上,他写成了《鞑鞞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论文。

8, 多项研究工作交叉进行,多次修改、补充以臻完善。

王国维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下旬至二六年五月间有关西北地理及蒙古史的研究工作情况如下:

一九二五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王国维从各种古籍抄录古行记七种,并进行校勘,其中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五月十一日,王国维从《连筠簃丛书》抄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历时十天,到五月二十日抄完。五月二十二日,从《辍耕录》抄录成吉思汗致丘处机诏书及丘处机致成吉思汗的陈情表,后来都作为注释收入他的《西游记校注》中。此后他随时将有关《西游记》的心得批注在眉端,于此同时他又进行搜集有关耶律楚材事迹资料的工作及讲学等其他工作。到八至九月时,写成《耶律文正公年谱》及《西游记注》初稿。九至十月,写成《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十至十一月,借沈宝熙藏萝榭书屋抄本《蒙古源流》以校光绪刻本《蒙古源流》,十一月至十二月,读《蒙古源流》数遍,并据《元朝秘史》、《元史》等书校释。于此同时,十至十一月,编写《元朝秘史山川地名索引》草稿,十一至十二月,写成《鞑鞞考(附鞑鞞年表)》初稿、《蒙文元朝秘史跋》、《蒙鞑备录跋》初稿、《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并以《元朝秘史》校何秋涛本《圣武亲征录》。

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一月间,王国维从罗振玉处借抄出《黑鞑事略》,随时写批注于书眉,同时写成《辽金时蒙古考》(即《萌古考》初稿)。二月二日,写成《黑鞑事略跋》。二月至四月,以《说郛》弘治、万历抄本《亲征录》与汪鱼亭本、何本互校,并详加注释,完成《圣武亲征录校注》。五至六月,他将《西游记注》又加工整理了一次。七至八月,写《西游记注序》及《蒙鞑备录又跋》,后来将《蒙鞑备录》二跋合并为一。十一月,从上海涵芬楼借到顾广圻监抄本《元朝秘史》以校叶德辉刻本。十二月,写《元刊虞伯生诗续编跋》。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写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二月,写《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及《致藤田博士书》二封。同月,以正统《道藏》本《西游记》校《西游记注》初稿,并据《道藏》姬志真《云山集》、尹志平《葆光集》补注三条。三月,写《金界壕考》。四月,读到日本《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译出其中箭内互《鞑鞞考》、津田左右吉《室韦考》与《辽代乌古敌烈考》。同月,收到日本刊足本《西游录》,为订正错字。同月,写《鞑鞞后考》,感到不够成熟,便摘出其中室韦南徙一章,写《黑车子室韦考》一文,至五月写定。五月,修改《辽金时蒙古考》定稿,改名为《萌古考》;接着修改《鞑鞞考(附鞑鞞年表)》定稿。同月,从《元朝秘史》眉批十余则中摘录七则修改补充后写成《蒙古札记》。①

从上述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二七年五月共二年余期间王国维的有关西北地理及蒙古史的研究工作(同时期内其他研究工作和讲课等未予记述)情况可知:王国维的多项研究工作是交叉

① 以上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王国维研究工作的有关蒙古史、西北地理部分的情况,见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国学论丛》一九二八年第一卷第三号。

进行的，不少项目经过多次反复整理、加工、修改、补充才逐渐完成。他的研究工作可说是不惮其烦、一丝不苟、力求完美。

4，工作极其勤奋，在有限期间孜孜不倦地完成巨量劳动，作出了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工作。

在上述一九二五年四月下旬至二七年五月二年一个月期间，王国维不仅作出了上述蒙古史、西北地理方面的大量研究工作，而且还用不少时间为学生讲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仪礼》等多种课程，给清华学校暑期学校、北京历史社会学会、燕京大学作各种学术报告，并撰写成《克鼎铭考释》（一九二六年春）、《孟鼎铭考释》（二六年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二五年八月）、《记现存历代尺度十七种》（二六年七、八月间）、《鄂侯鬲方鼎跋》（二五年十一、二月间）、《秦瓦量跋》（二五年十一月间）、《新莽嘉量跋》（二六、九、十月间）、《六朝人韵书分部说》（二六年秋）、《宋代之金石学》（二六年十一月）、《蜀石经残拓本跋》（二六年十一月）、《校本水经注笺跋》（二七年三月）、《尚书核诂序》（二七年五月）、《古史新证》讲义等等蒙古史、西北地理以外其他学术领域的许多论著，其中有不少为重要学术论著。

光是一九二五四月下旬至二七年五月二年一个月期间王国维孜孜不倦地完成的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大概是不少一般研究者一辈子也难以完成的。如果统计其从事研究工作二十余年间的全部研究成果（仅就其已刊印的各种著作而言，就达二百万字；其他未付刊的手批手校古籍中经他仔细批校的一部分，学术价值较高，数量有数百万字）和工作量，那就更为惊人，大概三、五个一般研究工作者在相同期间（二十余年间）也是较难完成的。

5，由于多年来治学一贯勤奋，逐渐积累起渊博的学识，王国维善于抓住符合学术发展需要的重要学术问题进行研究，以其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较全面地占有多方面第一手材料，解决了许多重要学术问题，其中有不少是学术上的重大关键性疑难问题，为我国学术发展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

王国维自幼好学，后半生从事学术各领域研究工作二十余年期间尤其勤奋，因此多年来逐渐积累起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水平愈来愈高。他在经学、古文字音韵学、史学方面造诣很深，并掌握日文、英文等外文，由于涉猎面广、在许多学术领域都作过研究，他熟悉甲骨金石、敦煌文献、汉晋木简、佛经道藏、正史、野史、文集、笔记等多方面不同来源的史料，熟悉目录、版本、校勘学，学识渊博，因此他能在各个学术领域内抓住重要学术问题，利用多方面材料，解决了大量重要学术问题，其中有不少是重大学术疑难问题。

在蒙古研究领域内，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狁狁考》、《胡服考》、《匈奴相邦印跋》、《高昌宁朔将军尉迟造寺碑跋》、《鞬鞞考》、《胡古考》、《黑车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等文都涉及到学术上的重要问题，并程度不等地加以解决，其中《鞬鞞考》、《胡服考》、《黑车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相当出色地解决了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鬼方昆夷狁狁考》则探讨了尤为重大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这个问题犹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以求得最后解决。在蒙古史以外的其他研究领域，如殷周史、甲骨金文、古器物学、汉晋木简、古戏曲史等方面，王国维也解决过许多重要学术难题，其中有不少属于学术发展上的重大关键性难题。他与罗振玉合撰的

《殷虚书契考释》等著作，他所撰写的《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释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考》、《三代地理小记》、《生霸死霸考》、《流沙坠简考释》、《宋元戏曲考》、《唐守大曲考》等等，都是解决重要学术问题的名著。

(五)

王国维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内作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为后人研究蒙古史作出了巨大贡献。迄今为止，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族史、元史的史学工作者以及考古工作者，无论是他的史籍校注本、他的辑集史料之作以及他的考证文章，都仍有很大学术价值，为我们进行研究工作时所经常阅读、使用。在其他不少学术领域内，情况也基本上如此。

尽管距离他去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迄今尚未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陈旧不堪、没多大价值。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上述王国维学术成果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加以分析，答案是很清楚的。

主要在于：在持之以恒的多年孜孜不倦的辛勤学术劳动中，王国维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学术工作经验，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掌握了严格的科学方法。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孜孜不倦的巨量劳动所作出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有持久的学术价值的。

从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来看：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而不是草率的；他的研究方法是符合科学的，而不是任意而为、好高骛远、不学无术地从事的；他的研究工作是从大量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花费巨大劳动循序渐进的，而不是脱离大量基础工作、东拚西凑、一挥而就地完成。他的研究工作课题是符合学术发展需要的，而不是脱离学术发展需要的。由于多年从事严谨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工作，他掌握了严格的科学方法，积累起丰富的研究经验，具有精深的学识，他善于选择符合学术发展的重要课题从事研究，以其渊博的学术修养解决了许多重要学术难题，在古戏曲史、甲骨金文、殷周史、古器物、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古史等许多尖端学术领域为我国学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个人天赋和个人际遇，主要在于个人努力。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是持之以恒的多年辛勤劳动逐渐积累成的，卓越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巨量汗水浇灌成的。在长期努力学习和工作中逐渐学会掌握严格的科学方法，学会怎样循序渐进、有效地工作，通过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逐渐提高水平。这大概是学术上有所成就者的必由之路。

王国维在他所写的《人间词话》上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段话可以说正是王国维及其他辛勤治学的学者们治学经历的真实写照。只有经过多年辛勤治学、探索，有时甚至搞到形容憔悴、食不甘味的程度，才会逐渐有所发现，取得学术研究上的重大成果。

(1982年5月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的讲学稿，7月改定于本校蒙古史研究所)